
中国对日外交战略 思想与实践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TOWARDS JAPAN

主 编 杨伯江

副主编 仇华飞 林 昶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TOWARDS JAPAN

中国对日外交战略 思想与实践

主 编 杨伯江

副主编 仇华飞 林 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 / 杨伯江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 - 7 - 5201 - 2447 - 8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中日关系 - 研究 IV. ①D822. 33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3462 号

中国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

主 编 / 杨伯江

副 主 编 / 仇华飞 林 昶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王晓卿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张旭东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22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447 - 8

定 价 / 8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 深入研究中国对日外交战略思想， 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高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中国外交又迎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新局面。这是契合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的新需要，是顺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是实现新旧交替、承上启下的新发展。

中国古语有云，“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这是中华民族进行战略谋划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要求，与时俱进，适时提出并执行相应的外交战略，为中国一步步登上国际大舞台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新时期，世界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调整，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增大，在保持对外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中国外交战略思想一脉相承，不断开拓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新境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地判断时代潮流的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和环境的变化特点，以战略的高度和前瞻的视野，因应国际因素的变化，拓展创新，全面推进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道路。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称，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之前历届政府战略思想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把中国的外交政策重塑为“积极参与”。

具体而言，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不断“采取新举措”，如国家领导人积极作为，精心选择出访国家，频密外访，积极推动中国在全球的外交布局；召集和承办重大国际会议，接待多国领导人访华，主场外交有声有色，不断提升软实力；国家领导人参与外交设计，各种场合传播中国文化，主动进取的同时强调互利共赢；周边外交坚持“两条腿走路”，坚决捍卫核心利益，同时加强合作、管控分

* 高洪，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歧，在全球事务中更积极地承担大国责任。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很显然，当今中国外交更具战略设计和主动进取的精神，着力“展示出新气象”，稳固和拓展了大国关系，稳固和发展了亲仁善邻、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以新的信心、决心和恒心积极投入多边外交，开展了多层次的半官方或民间的交往和交流，从而在新大国外交、新周边外交、新多边外交和新公共外交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中日关系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中国新型外交的大框架下进行全面审视。近年来，中日关系面临着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中日间的合作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关系、国民感情走低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实的中日关系，可以说正站在一个需要重新选择的十字路口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对日外交战略思想及其发展，探讨新时代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对日外交，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日关系。

201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联合主办、《日本学刊》编辑部承办了“中国领导人外交战略思想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上海政法学院、天津理工大学、重庆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领导人外交战略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尤其是新一代领导人外交战略思想、中国领导人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等议题深入研讨。主办单位还以会议主题面向全社会征集论文，得到了学界同仁的积极响应。征文由会议邀请的专家进行评审，《日本学刊》刊登了部分优秀入选论文。

本书内容在此次学术研讨会论文基础上形成，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论证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还选入了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界相关优秀成

果。作者从各自不同视角，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特别是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把握中日关系提出了若干建议。作者不仅从宏观角度论述中国领导人外交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也联系当今中日关系的严峻现实，为两国关系解困释疑提供了参考路径。部分曾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过的论文，收入本书时作者做了补充修改。

期待本书能够对中国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与中日关系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作用，也期待更多更好的相关研究成果早日问世！

2018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上 篇 新时代中国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

习近平国际关系新理念与中日关系	武 寅 / 003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对日外交实践	杨伯江 金 赢 何晓松 常思纯 / 013
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日关系“再正常化”的指导意义	高 兰 / 030
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日关系	王 蔚 汪骏良 / 046
从习近平涉日论述看中日关系新时代特征	张晓磊 / 062

中 篇 中国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回顾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对日政策	宋志勇 / 0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对日关系中的公共外交及影响	刘 晓 英 / 093
——以中日佛教交流为视角	刘建平 / 104
毛泽东、周恩来的日本观与对日外交战略发展	李 文 刘铭贻 / 117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日关系	林 昶 / 131
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林晓光 / 146
——简论中日友好思想与中日关系实践	杨伯江 / 156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跨世纪的中国对日外交	
“暖春”时节中日关系的形势与任务	

下篇 中国外交棋局中的中日关系

国际形势新变化与中日关系的可能前景	冯昭奎 / 167
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	朱 锋 / 197
中国周边地区局势和中日关系	张蕴岭 / 210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中日关系	仇华飞 / 223
中国公共外交与对日方略	门洪华 / 234
中美关系发展视域下的中日关系	夏立平 / 248
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构建	吴怀中 / 254

附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	/ 267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8月12日）	/ 269
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1998年11月26日）	/ 271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8年5月7日）	/ 274
中日四点原则共识（2014年11月7日）	/ 277

习近平国际关系新理念与中日关系

凡 著

上 篇

新时代中国对日外交 战略思想与实践

——习近平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

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外交思想理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道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推动中国外交取得历史性成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外交在新时代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外交思想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外交在新时代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和平，是指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是指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外交理念不是空想，而是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和时代特征提出的。

中国的外交理念不是空想，而是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和时代特征提出的。

中国的外交理念不是空想，而是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和时代特征提出的。

中国的外交理念不是空想，而是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和时代特征提出的。

习近平国际关系新理念与中日关系

武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战略理论和方针政策，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理念和一脉相承的立场观点，值得我们深刻领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治国理政时，把外交摆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提出了要把国际和国内作为一个大局统筹考虑的思想。^①中国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习近平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国不认同所谓“国强必霸”的理论，不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中国政府宣布，即使中国真正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②

一 习近平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

在新的历史时期，世界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调整，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增大，在保持对外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中国外交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和新实践。

习近平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有两个中心词：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合作”。和平，概括了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合作，则指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中国的和平承诺并不是在作秀，而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传承和发

* 武寅，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全国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原文发表于《日本学刊》，收入本书时做了修改。

① 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②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248、266页。

扬。早在秦汉时代,中国已经是世界闻名的大国强国,但中国奉行“德被四海”的外交理念,坚持不懈地用丝绸、茶叶和陶瓷开辟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和平商路。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拉开了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序幕,而中国留在这条海路上的,同样是和平与合作的足迹。可以说,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找不到对外殖民侵略与统治的记录。五千年文明传承至今,和平与合作的理念,早已融化在民族的血液中。

习近平国际关系新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政治领域

“和平”与“合作”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在政治领域具体表现为:习近平主张,各种分歧与冲突的解决,不应诉诸武力,而应该用对话去代替对抗,用政治解决代替武力冲突;各方要通过协商对话来加强沟通和理解;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①

在实践中,针对某些国家推行的强权政治,习近平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努力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强调中美两国应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增强战略互信,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有效管控矛盾,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目前,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 90 多个对话沟通机制^②,经济上的合作与相互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对待大国是这样,对待周边国家更是这样。中国对周边国家奉行的“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其核心思想和理论基础,正是和平、合作的国际关系新理念。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的发展,也使我国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帮助。通过与周边国家开展合作,构筑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和命运共同体。

(二) 经济领域

“和平”与“合作”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在经济领域具体表现为: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①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51、294、331 页。

^②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80 页。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努力以自己的行动,推动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全球经济更加强劲发展。同时,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①

(三) 文化领域

“和平”与“合作”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在文化领域具体表现为: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主张文明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是包容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都要珍惜。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被视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看待。^②

对待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中国采取零容忍态度,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恐怖行为。另一方面,中国始终把反恐与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二者严格区分开来,把伊斯兰文化与恐怖主义严格区分开来。

可以说,习近平提出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及其实践,给纷繁复杂、被难题困扰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它将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 习近平国际关系新理念之“新”意

应该说,习近平国际关系新理念的两个中心词“和平”与“合作”,其概念并非今天提出。那么,习近平国际关系新理念内含的“新”意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一) 时代性

以“和平”与“合作”为中心词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新就新在它的时代性。

^①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33、337页。

^②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59~260、273页。

“和平”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理想和追求，“合作”也不是今天才首次出现的新概念，二者作为两个独立词早已被分别使用，但是把二者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则构成了一个新的理论思考和体系框架。特别是在今天，冷战已经结束，但世界并不太平：从纷争战乱愈演愈烈的中东，到昔日田园牧歌、而今恐袭不已的欧洲，从剑拔弩张的东亚，到不再平静的太平洋，人们不知道究竟哪里还有真正和平的乐土，人们在为自己的安全担忧，也为世界的发展担忧。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习近平提出和平与合作的理念，具有很强的时代针对性，为解决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同时，这一理念在中国战略全局中的地位 and 重要性，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二）实践性

以“和平”与“合作”为中心词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新就新在它的实践性。

这一新理念不仅是立场和信念的昭示，而且是带有具体实现路径和手段的一种实践。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实际去做的。特别是它强调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都应该身体力行，为解决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纷争、战乱、危机、贫困，为清除一切阻碍和平的障碍，携起手来、真诚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己的作用。要相向而行，不要背道而驰；要大局观念，不要一己私利。只有真诚合作，才有真正和平。

（三）自律性

以“和平”与“合作”为中心词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新就新在它的自律性。

这一新理念并不是只要求别国，而是向世界表明，中国自己也要这样做。有的国家认为中国的新理念只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己并不打算这样做。中国越强大，这个问题越突出。对中国的强大，它们感到了一种威胁，不相信中国不想称霸。在这些国家看来，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变得格外敏感。中国宣示主权，被看作是在显示实力；中国强军自卫，更被解读成是要以武力实现自己的意图。因此，中国要以自己的行动让世界看到，中国不是在作秀，更不是在空谈。中国弱小时，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会引起太大注意，但今天中国发展了，综合实力增强了，中国的一言一行就有了新的含义。中国强大了，带给世界的是更大的和平希望和更多的合作机会。

三 国际关系新理念下的中日关系

习近平国际关系新理念当然也适用于中日关系。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既是大国关系，又是周边关系。因此，它对中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习近平自2007年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多次发表关于中日关系的重要讲话^①，阐明了中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基本态度。这既是国际关系新理念在中国对日外交上的具体体现，同时又鲜明地展现出中日关系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中有三点精神需要我们重点领会。

（一）高度重视中日关系

习近平谈到，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这一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中日友好事业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亚洲和世界有利，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精心维护，继续付出不懈努力。^②这是他多次讲话精神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中日关系非常重要，对两国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对中国来说，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和中国的近邻，始终是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两国关系友好时如此，两国关系恶化时更是如此。对日本来说，中国问题是明治以来日本外交始终不变的核心问题。为了征服中国，进而夺取东亚地区的霸权，日本一次又一次发动侵略战争，直到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对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却始终没有变。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做了积极探索和极大努力。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两国能够最终实现邦交正常化，结束战争状态，并在复交后使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正是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的结果。

进入21世纪后，大国博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中日两国在其中的角

① 参见《盘点：习近平8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中国网，2015年8月13日，http://www.china.com.cn/news/2015-08/13/content_36295249.htm，登录时间：2016年6月30日。特别是2015年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有3000多位日本民间人士参加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阐明中国的对日政策。在2015年“9·3”阅兵式上，习近平主席又强调“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其后又在巴黎、杭州、汉堡、岷港等地发表了关于中日关系的重要讲话。

② 参见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5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3/c_1115384379.htm，登录时间：2016年6月30日。

色和地位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态势。两国几乎是在以同样的量级,同时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中心。这是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在这种新情况下,两国应该如何相处?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性的、非同小可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绕不开、迈不过、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种新态势新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双边关系在各自国家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

(二) 发展对日关系是有原则的

我们坚持和平与合作的方针,但是这需要日方同我们一道,双方要共同努力,要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为基础,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持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①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既是双边关系,就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日本多次向外界表示,愿意与中国发展关系,而且是战略互惠关系。但我们实际看到的却是,自二战结束至今,执掌日本政权的保守势力一直在卖力去做的事情,并不是彻底与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一刀两断,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右翼保守势力在思想认识上,对日本自明治以来靠武力扩张博取大国地位的强权政治理念深信不疑,对战败给日本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不是痛定思痛、深刻反省,而是耿耿于怀,发誓要东山再起。昭和天皇投降诏书中所表达的意思,不是认输,更不是认罪,而是所谓成王败寇、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是卧薪尝胆、力图再举的信念。“要耐所难耐,忍所难忍”,要“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笃信道义,固守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以期不落后至于世界形势之发展”。^②这一信念战后被右翼保守分子视为座右铭。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政府就开始考虑参拜靖国神社和为战犯歌功颂德的问题。1964年1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恢复对二战中的战死者授衔和授勋的工作。许多重要的战争罪犯在战后被授予军功章,成为日本国家与民族的“英雄”。1969年6月,《靖国神社法案》第一次被提交国会。日本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也延续至今。这些行为都清楚地反映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对侵略战争的错误认识和信念。在日本首相战后70周年的讲话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种信念的影子。这也再一

① 参见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5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3/c_1115384379.htm, 登录时间:2016年6月30日。

② 「大東亜戦争終戦詔書」、1945年8月14日、中野文庫、<http://plaza2.mbn.or.jp/~duplex/shou/ss20.htm>2002/10/19, 登录时间:2016年6月30日。

次证明了这种信念一直被战后右翼保守势力奉为行动指南。二战后的日本宪法否定了日本拥有军队和发动战争的权利，但死心塌地要继承战前遗产的右翼保守势力为重整军备编造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他们鼓吹作为一个国家，日本至少要有用来自卫和防御的力量，不可能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即使不去侵略别人，也还需要防止被别人侵略。这种借口所包藏的祸心明眼人一看便知，因为武装力量是用来侵略的，还是防止侵略的，这并不是绝对的，它完全可以在特定的原因和条件下互相转化，特别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谓的自卫和防御只会沿着危险的道路越走越远。

二战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掌控日本政坛的右翼保守势力正是打着自卫和防御的旗号，开始重整武装的。和平宪法颁布后不久，保守势力修改宪法和重新建立武装力量的行动就相继开始了。从战后不久的改编国内警察力量起步，日本战后武装力量的发展，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演变，其名称不断变化，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装备不断升级，系统不断完善，功能不断拓展，走的是一条舍名求实、小步慢跑、积少成多的渐进式道路。如今，日本自卫队的足迹早已超出亚洲，遍布世界各地。

这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由谁来统领呢？日本战后围绕武装力量的重建和动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其中规定，首相统率陆海空三军，握有军事大权。^①至此，内阁首相已经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其权力大到了明治以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首相可以动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资源，去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当今的日本首相提出了一个口号，透过这个口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政府的立场、外交政策取向以及对华关系的发展态势，它就是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它与习近平倡导的和平、合作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保守势力用自己的所作所为，诠释了“积极和平主义”是单边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它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显示军事力量和大国的存在感，介入与己无关的国际争端，不惜损害他国利益。而习近平倡导的和平与合作的新理念则是双边的和多边的，不仅宣示和平，而且要通过合作去具体实现。是否愿意并真正开展合作，是检验有无和平诚意，检验真假和平的试金石。对日本政府来说，就是能不能做到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为基础，以正确的历史观对待侵略战争，真正与中国携手同行，通过对话而不

^① 「自衛隊法」、『小六法』（昭和57年版）、有斐閣、1981年、440頁。